

论艺术 与政治的关系

——评柏拉图的艺术
功用观

○李保林



就艺术的社会功用说，柏拉图明确地肯定了艺术要为社会服务，要用政治标准来评价。在这问题上他有两个极不正确的看法：第一是他因为要强调政治标准，就抹煞了艺术标准。其次他因为要使理智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就不惜压抑情感。因而他理想中的艺术不是起全面发展的作用，而是起畸形发展的作用，即摧残情感去片面的发扬理智。

柏拉图继承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美必定有用”的观点，衡量美的标准就是效用，有用就美，有害就丑。柏拉图把这种目的性接纳到他的“理想国”中，就是“保卫者”或统治者的教育，所以柏拉图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诗和艺术在这种教育里应该占什么地位。教育计划要根据培养目标，培养目标就是理想国的“正义”，所谓“正义”就是在城邦里各个阶级都站在他们所应站的岗位，应统治的统治，应服从的服从，形成一种和乐的有机整体。这与我国春秋孔子所提倡的君臣父子、仁礼道德、三纲五常似的伦理关系非常相似。柏拉图认为最高等级是哲学家，其次是战士，最低的是农工商。并把这种等级划分应用到人身上。人的性格中也有三个等级，相当于哲学家的是理智。相当于战士的是意志，相当于农工商的是情欲。人的性格要达到“正义”，意志和情欲也就要受理智的统治。基于这种教育理想，他对艺术的影响作了一些心理分析，发现荷马和悲剧诗人们把神和英雄描写得和平常人一样满身是毛病，互相争吵、欺骗、陷害；贪图酒食享乐，既爱财，又怕死，遇到灾祸就哀哭，甚至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他讽刺道：“摹仿诗人既然要讨好群众，显然就不会费心思来摹仿人性中的理性的部分，……他会看重容易激动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因为它最便于摹仿。”他指出与悲剧相关的“感伤癖”和“哀怜癖”。感伤癖是“要尽量哭一场，哀诉一番”的那种“自然倾

向”。在剧中人物是感伤癖，听众就是哀怜癖。他认为这样的艺术只是情感的渲泄，不能给青年人带来坚忍毅力的熏陶；认为荷马史诗以及悲剧和喜剧的影响都是有害的；它们只能使柏拉图理想国的“保卫者”丧失理智，破坏“正义”。“它们都理应枯萎”。他完全否定了艺术表现人性，表现情感的事实，粗暴地对艺术进行了“清洗”。从本质说就是要使所有一切的艺术都符合奴隶主的统治，使一切艺术都来为专制统治服务，如果一旦出现与他们利益相悖的艺术，他们就要毫不留情地驱走它。“我们要告诉他：我们的城邦里没有象他这样的一个人，法律也不准许象他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把他洒上香水，戴上毛冠，请他到旁的城邦去。”柏拉图的这种为阶级集团服务，肃清一切“异端”学术的思想到黑格尔得到了发展，形成了国家主义。

柏拉图的思想渗透着一种至高无上的使命意识，即维护奴隶主统治的一切思想都是好的，反之则应该立即铲除。要使一切思想艺术都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以确保理想国的巩固。我们从《理想国》卷十看：“你心里要有把握，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甜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由此我们立即会想到中国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文化大革命“拔毒草”、“铲毒根”层出不穷的惨无人道的暴行。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残酷压制和摧残。

柏拉图教育给人的理想就是集体、国家、忠诚的概念，使人的团体意识形态紧紧围绕着它们，“保卫”是他们最高的、压倒一切的道德，其他常识范围内的道德规范、意识形态都必须服从于当时统治秩序的最高道德法则。这样产生的后果使他们的行为都是奉命而为的。当他们去掠夺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当他们去迫害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时候，他们心中却充盈着完成国家使命的狂热热情，并自认为是人类最高觉悟和意识的承担者。他们是在忠于国王、忠于阶级的旗帜下进行的。即是说，他们只是集体意识形态的运载者，只是统治意识形态的执行工具。这样就直接导致了大国沙文主义和维护强权暴政。

柏拉图这一思想也给卢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

卢梭的基本主张，是他的人民主权论。它一方面评击霍布思的君主专制主义，反对主权在君主；另一方面又否定洛克关于天赋人权和任何人不得侵犯的主张，认为主权者有权利也必须要求公民转让自己的全部权利。这里包含着两个重要的论点：一、个人权利必须全部转移给整体；二、主权者即全体人民。其理论的核心就是他所谓的“公意”学说。所谓“公意”，系指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主权无非是公意的表现，因而是统一的，是不可剥夺与分割的。因此不能用其他权力来制约。这里卢梭直接反对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论。在他那里，法律不过是公意的表达。因此，“主权者超乎法律之上，没有任何一种法律可以约束人民共同体；主权者无需向臣民提供任何保证。”换句话说，主权者可以任意行使权力；国家有权支配臣民的一切财产；主权者对臣民掌握有生死权，因为后者的生命乃是“国家的有条件的一种赠予”；任何人若是不愿服从主权者的意志，则全体有权强迫他服从，也就是迫使他无条件接受。

可见，柏拉图这种教育思想给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是对人性的扭曲，对真正“正义”的迫害，是反动的。

此外，柏拉图还检查了文艺摹仿式对于人的性格的影响，依他分析，文艺摹仿方式不外三种。第一种是完全直接叙述，如悲剧和喜剧；第二种是完全用间接叙述，“只有诗人在说。”如颂歌；第三种是头两种方式的混合，如史诗和其他叙事诗。柏拉图认为第二种方式最好，最坏的是戏剧性的摹仿。他反对理想国的保卫者从事于戏剧摹仿或扮演。这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一个人不能同时把许多事做好，保卫者应该“专心致志地保卫国家的自由”，“不应该摹仿旁的事”；第二个理由是演戏者经常摹仿坏人坏事或是软弱的人和软弱的事，习惯成自然，他的纯洁专一的性格就会受到伤害。他的这种教育方式是呆板简单的，是和贺拉斯“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相反的。他认为理想国的文艺主要是歌颂神和英雄的颂歌，这种颂诗在内容上只准说好，不准说坏；在形式上要简朴，而且象《法律》篇所规定的那样，应该象古埃及建筑雕刻那样，固守几种传统的类型风格，代代相传，“万年不变”。此外，柏拉图还特别仔细地检查了音乐。在当时流行的四种音乐之中，只准保留音调简单严肃的多里斯式和激昂的战斗意味强的佛律癸亚式。他的关于音乐的判决书不仅表现出他对音乐的理想，也表现出他对于一般文艺的理想。“我们准许保留的乐调要是这

样：它能很妥贴地摹仿一个勇敢人的声调，这人在战场和在一切危难境遇都英勇坚定，假如他失败了，碰见身边有死伤的人，或是遭遇到其他灾祸，都抱定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奋斗下去。此外我们还要保留另一种乐调，它须能摹仿一个人处在和平时期的，做和平时期的自由事业，……这两种乐调，一种是勇猛的，一种是温和的；一种是逆境的声音，一种是顺境的声音；一种表现勇敢，一种表现智慧。我们都要保留下来。”在这里，柏拉图提倡一种英雄主义的积极向上精神和一种谨慎从事的作用，是对社会有益的，也是符合艺术所应体现的目的的。但他却把音乐这个浩瀚的海洋绝对化地规定为只准表现上面两种内容，却违反了艺术的规律。人的情感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只有他所规定的两种，人活着，各种不同的情感都会要体现出来，而柏拉图却对其它的情感体现加以扼杀，这又是他的阶级局限决定的。而后来的尼采严词指责瓦格纳的音乐是各种颓废情感的麻醉剂，是和柏拉图的上述思想同出一辙的。

总之，柏拉图把文艺不脱离政治的关系扩大到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是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和他本身的思想、阶级所支配的，他的思想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同时使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直至马克思才真正得到正确的阐述。文艺和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由经济基础制约和决定的，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治与文艺虽然会发生影响，但不存在谁决定谁，谁从属于谁的问题。从文艺反映的社会生活来看，文艺是以整个社会生活为反映对象，即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军事、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等方面。文艺除了反映政治外，还要反映刚才所说的诸方面，还要涉及到精神和个人生活的问题，而这些并不与政治发生关系；从文艺的社会作用看，文艺为政治服务，可以说是文艺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但不是全部功能，即使是教育作用也不能仅仅认为是政治教育，它还有感情教育等等；从文艺的创作实践看，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是否正确，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把文艺看作政治的内容和目标，一旦出现政治不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时候，文艺就很可能走向邪路。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李嘉